

一曲难忘

杜毅 杜颖

去年五月上旬，妹妹杜颖病危——肺栓塞、心肌梗塞、多脏器衰竭。医院发下“病危”通知后，她即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入夜，我坐在华东医院候诊室的长排木椅上，漫漫长夜，思绪万千。

上世纪上半叶祖国危亡的年代，爸爸立志以实业救国，创办窑业公司，用国产瓷击退了东北日本寇的经济侵略。日军下密令：“缉杀反日巨头杜重远”。虽身遇险境，但爸妈放弃了宋庆龄先生推荐他们去美国工作的机遇，听从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毅然飞往新疆，投身建设抗日大后方的队伍。抵疆后，爸爸做出了成绩，却遭到当地军阀盛世才的猜忌。谁也不曾料到，爸爸“不死于强寇，而死于国贼”。盛世才灭绝人性，连尚是幼、婴儿的我们都不放过，将我们关进当地开放性结核病房两月余，以病菌杀害我们，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令我们全家殒陷恶疾，终身“割割痛苦，守候无望”。

晨光熹微，啼鸟凄凉。那天上午，我去参加上海市长宁区委隆重纪念爸爸120周年诞辰油画及文物瓷器双展会，眼前的一切令我精神一振：展厅就设在愚园路历史名人墙隔壁，街沿花木扶疏，“名人墙”上悬挂着一幅幅油画，追述着爸爸拥党一爱国一救亡一慷慨赴死的历史悲情，使参观者忆起“八一三”不堪回首的画面：日军大轰炸，上海南站，一片血海，满地焦尸，婴儿独坐，绝望哭泣……现场人头涌动，观者川流不息，感叹不已。这个展览极为成功，复旦大学、宋庆龄陵园、交通大学、松江大学城也纷纷接棒邀约延展。一个月后，从复旦大学布置精美的展厅出来，返回医院的路上，我感到初夏的惠风有力地托住了我，仿佛看到云端爸妈的微笑……

1946年春，妈妈护携幼小病中的我们从新疆回到上海（注：杜重远和侯御之在新疆育有女儿杜毅、儿子杜任，杜颖是遗腹女），住进爸妈当时的婚房——霞飞路1881号（在今淮海中路）一座地中海式老宅。妈妈独上西楼，我们姐弟卧病小床，偌大的后花园，果树蓊郁，静悄悄。然而，这份病中安静，也被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来沪抢房而打破。庞然如山的“将军”带兵进驻爸妈老宅。他的理由：妈妈没有房产证，而这幢老宅被日寇占领过，他有权没收收产。妈妈据实反驳：这幢楼房与花园是1932年宋子文建议爸爸买下与宋家为邻的。30年代末，爸妈远去边疆，日军入侵上海，霸住此房，房产证等均被倭寇烧毁。对方说理不过，羞恼成怒，命手下士兵将我家的一些家具、细软，用卡车送往沪上“行政院”（宋已不在上海）。妈妈和我们被他强制赶出家门。妈妈抱着小妹妹，我牵着小弟弟，姐弟二人还穿着拖鞋，登上老宅家门斜对面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叮叮当”驶向十六铺终点站，再从十六铺返回霞飞路（现武康大道）终点站。一家孤、小，一夜蜷缩车厢，流落街头。小弟弟、小妹妹都已睡熟。我开始还好奇观看有霓虹灯闪烁的夜景，后来感到肚饥，乏困，而进入了有“叮叮当”车声的梦乡。第二天，《大美晚报》刊出“杜重远身后凄凉……”的报道。

锣鼓喧天，换了人间。中央政府很快将我们一家妥善安置。始料不及的是，结核菌已掏空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多种恶疾悄然袭来。妹妹最小，她降生在新疆牛房，襁褓中即多病，到1958年总爆发：日夜高烧40度，持久不退，吐血，尿血，便血，皮下大片紫斑，血小板只有两万。住在中山医院，林兆耆院长多次组织院外会诊，均拟诊：淋巴肉瘤、胶原病、白血病……不能确诊，无法对症下药，病势日重一日。一次次报“病危”，多次无麻药骨髓穿刺。14岁的小妹撕心裂肺，锐声哭喊，惊动了周总理办公厅主任周刚（姚依林副总理的夫人）。她找到刚从太平间出来（想进去了解遗体放置情况）的泪流满面的妈妈。周彬阿姨执手相劝：“立即写信向总理求救，我回北京面呈。”妈妈依言，含泪成书。周总理接函，当天下午即召开全国有关医学专家电话会诊。专家们一致认为为罕见的恶性肿瘤，建议用大剂量激素，小量化疗、放疗试治疗。周总理并咨询到广西柳州有一个专治这种恶疾的国民党罗姓军医（他正在服刑中）。当天津的一种特殊止血粉，用飞机送到上海之时，罗医生也在两名狱警押送下到达上海中山医院，立即开展治疗。在周总理争分夺秒、不遗余力组织抢救下，再加上中西医结合治疗，经过半年时间，小妹奇迹般重返人间。这一事迹，感动了多少海内外亲友甚至素不相识者。我们听到的千言万语，综合起来可归并为一句：“共产党，周总理，缅怀先烈，怀念故人，不忘老朋友啊！”妹妹出院回家后，不顾身体虚弱，日夜用细竹条，“复制”我们居住的二层

普爵士举办盛大宴会接风。爵士的敬意、诚意，市长流利的英语，诙谐的谈吐，拉开了中英水务合作的良好序幕。

但我高兴得太早。以BOT（建设、经营、转让）这种方式引进外资投建基础设施，是改革开放早期一个全新的举措，无任何政策可援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免被扎得滴血。在当时国际形势下，中英双方商务代表均无安全感。谈判进入角色太慢，拉锯战太长。当迟悬已久的大场自来水BOT合同终于签署时，作为14家外国银行联合贷款的第一个全外资项目，它轰动了国外金融市场。

在进行大场自来水项目引资的前后，我们也开始煤气、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更多项目的考察活动。其中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引资投建发电项目。这难度就更大了，不仅耗资更巨（每个项目十几到几十亿美元），还牵涉各种无法估量的因素：多变的中美关系，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一个大项目从开始谈判到结束，可能长达十年、十二年甚至更久，那种不知未来的煎熬，不堪回首。在屡战屡败的日子里，杜氏公司有了绰号叫“病氏公司”“失败公司”。大约2003年元旦前夜，我公司办公室一片漆黑，有人，但无语。我端着蜡烛、蛋糕走进来，照亮了同仁们绝望的面容，闪烁的蛋糕鼓励他们屡败屡战。蛋糕鼓励，来自爸妈的言传身教：“挺住，一定成功在后”，“永不言弃，化不可能为可能”。这些项目最终相继成功，并被上海主要媒体多次报道。

我们经手的一些项目获得成功，给海外商界以巨大信心，他们持续到中国投资。1997年，埃克森美孚、ABB、阿海珐等大集团聚在法国巴黎商讨讨贷款事项。他们为感谢“杜氏公司”，联合在巴黎香榭丽舍兰卡斯特大酒店三层半露天大阳台上，举办盛大玫瑰宴。露天雕栏画栋上，摇曳着红花绿叶。大阳台中间，长型宴会桌上，酒是玫瑰红；每副餐具旁，一枝玫瑰独秀；空气中氤氲玫瑰花特有的香甜中，60余位贵宾落座。我宣布：该晚背景音乐中，我将放一张特殊的碟片——妈妈气管切开后，我再也听不到妈妈悦耳的声音，所幸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妈妈青年时录制的仅存的两张碟片——我要播放的是“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当听到妈妈用如此娴熟的法语演唱时，掌声雷动。唱到“你拥我入怀”这句，五彩缤纷的氦气球突然从阳台漂浮半天空，黯淡了漫天的星斗。

黄昏伊始已现晚霞，冬日变短。去年是爸爸杜重远诞生120周年，妈妈侯御之病逝20周年。我和妹妹有意无意会坐在“紫藤小屋”阳台上，眺望同在淮海中路的爸爸的老宅——“紫藤小屋”是我曾经想写的自传体小说的书名，而今竟成为我和妹妹居住的以鲜花、玩具娃娃为主题的宝蓝色童话小屋的名字。

1932年，爸爸购得那处花园老宅，一是和妈妈结婚时想给她一个惊喜。二是1931年冬，爸爸与周总理在叛徒告密、异常险恶的境况下见面，肝胆相照，从此接受党的领导。他认为：常与达官贵人在宅内相聚，是与地下党密约最好的掩护。1933年3月25日杜氏老宅两座锻花铁门大开，众名车鱼贯从东门进，西门空车出。最后是一辆饰满鲜花的婚车——爸妈礼拜堂婚礼结束，回来接待后花园午茶会上诸多贺客，其中有地下党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高官、将领，社会名流。爸爸像一根红线穿绕在宾客友人之间，畅谈“家和万事兴”，宣传党的统一战线——当时面临白色恐怖，杨杏佛、柔石、史量才相继倒在暗杀的血泊中。老宅见证：后花园，室内大厅，曾多次举行京剧宴会，探戈舞步，小型音乐会，在聊天、共舞中，张闻天三次密电爸爸都及时收到。老宅见证：1936年4月，张学良借赴南京开会之机，来此探望爸爸（那时因“新生事件”入狱的爸爸已保释，可以回家），基本谈定联共抗日大局，忽然发现有可疑“耳目”，张学良与爸爸改去小树林密谈……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夏，爸爸帮助马占山运武器上前线，遭遇敌机轰炸。《到大同去》的文章里，爸爸

写道：“原定六点前由沪出发，国人对于约会时间向不坚守，出发时已至下午七时了……万里无云，一轮明月，两部大卡车浩浩荡荡奔苏州而来……据守军说，六时许，敌方飞机三架沿途轰炸甚烈，倘此卡车先一时而至，正好作了敌人的目标，有全行炸毁的可能，看来国人之不守时间，亦自有他的妙用！”我好像听到爸爸站在老宅阳台上，从容叙述：“在南京停留三夜，每夜敌人飞机必来光顾三、四次……来时先鸣笛警告，继用探照灯远照，照准机身时，再放高射炮……夜间火光四射，灿烂非常，大有儿时正月十五看灯之概！”

老宅阳台烽火又变成了飞雪飘飘——1939年，飞往新疆的前夜，在香港弥敦道自家小白楼屋顶花园上，爸爸愧疚问妈妈：“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一定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妈妈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爸爸拥抱了妈妈，信誓旦旦：“一定陪你去，我们二人世界太少了。”不知何处传来优美的《鸳鸯茶》旋律：“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鸳鸯茶，鸳鸯品，你在我心，我在你心……）

爸爸受酷刑后，在《孩子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妈妈的：“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日记本背面已是血迹斑斑，妈妈又哭湿了日记封面。为弥补我，妈妈剪了一幅她与爸爸对饮咖啡的剪纸画，贴在《孩子日记》背面。我泪流满面地想：现在爸爸妈妈可以在那个世界一起喝咖啡了。

妹妹从“紫藤小屋”拿出夏威夷电吉他，弹奏了这首爸妈最后未能如愿的《鸳鸯茶 Tea For Two》。她虽久病未抚琴弦，这天却如有神助，弹得极为悠扬悦耳，引得一群倦鸟绕路转来，盘旋良久，随后忽而飞回那座杜氏老宅树丛的深处……

望着夕阳幻影中老宅阳台的方向，我随掌声，轻轻替爸爸哼唱这首尘封老歌：

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鸳鸯茶，鸳鸯品，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你在我心，我在你心
……
Day will break and I’m going to
awake

天一亮，我就醒
And start to bake a sugar cake
烤一块，糖心饼
We will raise a family
我俩会有个好家庭
A boy for you and a girl for me.
儿子你牵，女儿我领
Can’t you see how happy we will be!
瞧瞧我们家，人人笑盈盈



日前，我有幸观看了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承蒙讲解专家博征广引、深入浅出的系统介绍，对董其昌这位中国文人画史上的巨匠、海派画坛的开山大家有了全面与直接的了解，受益匪浅。

本次画展除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内藏品之外，又向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博物馆等海外收藏机构商借到重要作品。可以说，大展不仅彰显了董其昌艺术成就的国际影响力，也凸显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魅力与影响力。

我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对文学艺术只是门外汉，业余喜爱而已。听完讲解专家生动讲述董其昌在各个时期的一系列代表作所展现的绘画变革与理论思考，特别是对其“笔墨论”“南北宗论”的阐释，使我进入了边观看边思考的状态。画无笔墨不成画，然而，笔墨不仅仅是表现形象的手段，更是呈现画家心象的载体。笔墨之中有美感、有精神，这就是文人画。董其昌借禅学的南北二宗，提出了在中国画史上极具影响的南北宗论，抛开有关争论不说，其“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独树一帜”的创新勇气也值得今人学习。

漫步上博，我由海外参展的董其昌精品感觉到其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又由此联想到董氏所处的晚明时期的国际画坛，脑海里不禁浮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三杰”。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查询了有关信息。非常巧的是，董其昌（1555–1636）确实与文艺复兴“艺术三杰”中最后过世的米开朗基罗（1475–1564）有时间上的交集，米氏过世时董其昌九岁。

我去过意大利多次，也到过佛罗伦萨，不仅在第一次见到文艺复兴巨匠名作时感到震撼，而且每次有机会一定会再看，每次的观感都不尽相同。我不知道董其昌或者他的同代人是否了解西洋画及文艺复兴，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家人们是否知道东方的山水画。但是时间上的偶合也许包含许多不知的内在联系？借此机会抛砖引玉，略表几点想法：

首先，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商业发达，财富积聚，资本化生产蓬勃兴起，中世纪的宗教禁锢已经开始松动。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奏，文艺复兴中的“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已经为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董其昌所处的晚明虽然外患将至，但是江南的暂时的安定富庶，为江南画派（松江派）的兴起提供了充裕的条件与土壤。

其次，文艺复兴的“文学三杰”对后来的“艺术三杰”的影响不可小觑，而“艺术三杰”及同代一大批杰出艺术家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激励更为重要。艺术与科学一样，需要创新环境与创造群体（critical mass），他们不需要一样，他们需要不一样！以董其昌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承上启下地开启了文艺复兴中最为伟大最辉煌的篇章。晚明艺术巨笔董其昌的出现也非偶然，他上承赵孟頫、元四家等，同时期交游的同道则有陈继儒等一大批书画家、诗人、收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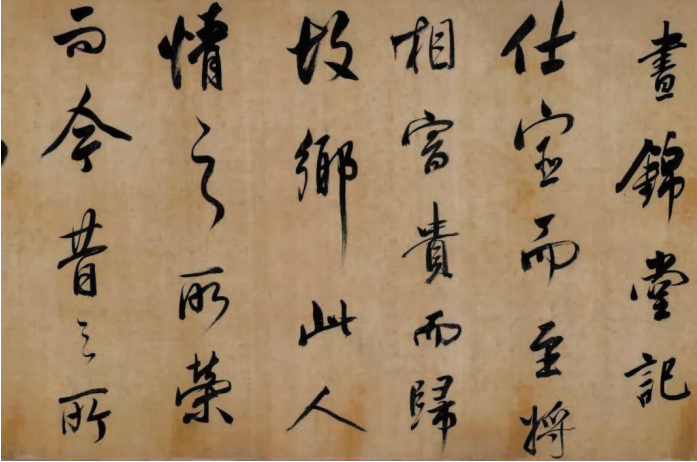
达·芬奇不仅仅是艺术家，还是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的科学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他的艺术成就。《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抓住了面目的细微表情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触动了观众的心灵。米开朗基罗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名师，站在《大卫》面前或者在西斯廷教堂里仰望《最后的审判》，会感悟到为什么艺术对人类文明是不可或缺的。

拉斐尔也是画家和建筑师。董其昌以古人为师，他的书法融合了历代名家风格而自成一体，始为大家。他以书入画，以笔墨写意，敢于并善于探索，重在气与神，终成巨匠。书画同为大家，史上不多，同时又兼具理论创新，更是罕有。

可以说，文艺复兴前“文学三杰”与后“艺术三杰”，前闯后继，冲破了封建中世纪的禁锢，不仅解放了文学艺术，也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董其昌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为例，虽然其父亲是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但是他没有子承父业、一生专注艺术创作，终成大业。在他那个时代，董其昌不能不受儒家读书做官的影响，科举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他的生命寄托更多的是在书画艺术上。不过，董其昌虽为文人画的代表，但对时代风雨、社会变革却少有作为。文人画也许不过是有官、有钱或有闲的文人墨客消遣之雅事，难以产生巨大社会影响（更不用说宫廷画派了）。而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中也凸显同样现象，以史为鉴，更令人深思。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丹青宝筏”展中的作品展出时间不同，敬请留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2018年12月7日–2019年1月20日，宋（传）惠崇《江南春图》：12月7日–1月20日，元倪瓒《六君子图》：12月7日–1月22日，北宋苏轼《楷书祭黄几道文》：12月17日–3月10日，东晋王羲之《鸭头丸帖》：12月24日–3月10日，北宋赵佶《雪江归棹图》：2019年1月23日–3月10日，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2月5日–3月10日。下图为吉林省博物院藏《昼锦堂图并书记卷》局部，左为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青竹图轴》，董其昌万历四十五年（1617）六十三岁时作，追董源笔意。

——编者



「文汇报会」
微信二维码



筆會